

# 田野與文獻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特稿

《通訊》二十年——田野與文獻研究的結合

· 廖迪生

關於《通訊》文體的一點淺見

· 程美寶

### 田野考察筆記

運河上的古橋——以紹興龍華橋、廣寧橋為例

· 蔡彥

###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大埔元洲仔大王爺誕考察報告

· 趙惠文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八十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588939 傳真：(852) 31758145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 《通訊》二十年——田野與文獻研究的結合

廖迪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

1995年10月15日，《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的第一期面世，此後以一年四期的季刊形式出版；屈指一算，《通訊》已有20年的歷史。20年來，《通訊》收錄了超過350篇文章，所有稿件均不設稿酬，而且可以公開在網上下載，這是一眾投稿者支持的成果。

華南研究中心在1997年成立，但《通訊》的產生比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還要早。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通訊》是華南研究中心能夠在香港科技大學成立的一個基礎，也可看成是推動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向的一個宣言。在這20年，《通訊》可以說是成為了一個學術交流分享的平台。當然，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向，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物，西漢司馬遷走遍不同地方，搜集資料，撰寫《史記》，明末徐霞客尋訪名山大川，以實地的材料，書寫他的《遊記》。當今學術研究百花齊放，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的地方和領域，以不同的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建立起不同的交流平台，而我們這個只是眾平台中的其中一個。

從我的經驗過程來看，這個田野與文獻結晶的孕育，是基於一個簡單而特別的因素——「田野研究的吸引力」，直接從複雜而又多姿多彩的現實世界中搜集研究資料。雖然田野研究好像是人類學家的專項，但香港人類學專業的發展，是1980年代的事，而田野研究方法的應用，在香港的歷史研究中，有比較早的發展。開拓客家及族譜研究的羅香林教授就是要跑到田野，為研究項目搜集資料。<sup>1</sup>我對「田野研究」的認識，始於198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學。當時歷史學系的科大衛教授，推行「東亞研究中心」的新界口述史計劃，一批歷史系的老師及學生，跑到田野做研究：觀察儀式、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搜集地方文

獻等，<sup>2</sup>這個計劃收集了很多香港新界的地方文字資料，後來彙編成《新界文獻》<sup>3</sup>，成為今天瞭解新界社會歷史的重要材料。這也是開展香港本土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成立人類學系，歷史學系碩士生蔡志祥擔任助教，他雖為歷史學者，卻與人類學有不解之緣。他在台灣大學主修歷史本科，也熱愛台大人類學的課程。在中文大學，他以人類學系助教的角色，推動本科同學進行田野研究工作，<sup>4</sup>在華德英教授（Barbara E. Ward）<sup>5</sup>的指引下，於1979-81年間開展了「高流灣研究計劃」，為剛成立的人類學系注入了田野考察的元素。華德英教授是第一位在香港進行長期深入的田野研究的人類學家，她的研究對象是西貢滯西洲的漁民。高流灣是香港東面偏遠的一個漁村，而「高流灣研究計劃」亦很有華德英研究方式的影子。

及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學生，繼續他們田野研究的興趣，並維持在週六舉行田野個案報告的傳統。在這些活動中，凝聚了一批對田野與文獻有興趣的學生。這一批學生中有些繼續升學，成為後來田野與文獻研究的生力軍，有些參與組成「華南研究會」<sup>6</sup>，時常支持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活動。

## 一、歷史與人類學的結合

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成立，其人文學部成立之初，不設獨立學科，而是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以跨學科的科際綜合作為發展方向，在學部主任教授徐泓的領導下，設立了歷史及人類學的元素。歷史學教授蔡志祥認為歷史與人類學的結合，可以為中國研究發展的一個方向，於是從1993年起，在人文學部聘請人類學的同事，成

為香港科技大學裡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開端。

如何推動香港科技大學的歷史及人類學的結合呢？香港地處華南的中心，有連接中國與外地的橋樑作用，因而以華南地區作為研究的起點，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華南研究不可能不包括中國大陸，所以在開展研究工作之初，大家都認為與中國大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非常重要。中山大學的陳春聲及劉志偉教授都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此外，還有廈門大學的鄭振滿及陳支平教授、韓山師範學院的黃挺教授、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及嘉應學院的房學嘉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方面則有蔡志祥、廖迪生與張兆和等教授，以及馬木池與黃永豪等博士。當時大家都明白，若以簡單的「華南」地域概念界定研究範圍，容易劃地為牢，排斥其他研究。所以我們是採取一個寬鬆的概念，所謂「華南研究」，就是以華南作為一起點，放在一個全球脈絡中去理解人類社會與歷史。

## 二、建立交流平台

這個跨地域的合作如何開展呢？我們在香港科技大學提出的一個研究計劃——「在鄉商人：華南地域社會研究」，創造了一些機會。這個計劃得到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在1994年展開。在這個計劃之中，我們進行了很多研究、合作及交流活動。當年的電腦網絡還未發達，因此很多時候，大家都相約在深圳開會，以討論活動內容和處理文件簽署的工作。

在這個合作與交流的過程中，大家意識到田野工作與文獻研究之重要，亦明白研究資訊的交流與分享的急切性，於是大家便合作設立「華南研究資料系統」平台，這個系統成員包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歷史系、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及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華南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更成為出版《通訊》的合作伙伴。

透過這個交流平台，我們舉辦學術會議，其中一個在廣州舉行的學術年會，從1995年開始，

共舉辦了13年。合辦單位包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東省中國經濟史學會及華南研究會。此外，從2001年開始，華南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每年合辦兩次「研究生研討班」，讓不同大學的歷史及人類學專業的碩士及博士生發表他們的論文研究成果，並且可以相互認識，切磋經驗。今年秋天舉行的，將會是第30屆。

香港「華南研究會」曾是我們的主要合作伙伴，華南研究會是一個業餘的學術團體，其中一個主要創辦人是蔡志祥教授。我們定期於香港科技大學舉行學術講座，講座多安排於週六舉行，方便公眾參加；所有講者都是義務性質，不取分文。此外，我們也與華南研究會和各大專院校合辦田野考察活動，目的是帶出田野考察、參與觀察的重要性。如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的滬西洲洪聖誕，我們都會組織「花炮會」參加，學習當地人的參與方式，準備燒豬及祭品，體驗和感受民間宗教活動的過程。2015年的洪聖誕是我們連續第16年的活動。

## 三、田野中的文獻

中國文字文化，源遠流長，但在長久的歷史中，文字都主要掌握在官員及讀書人的手裡，而「歷史」的書寫，都與這些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主要以文字作為資料的研究，都容易集中在王朝國家的議題上。那些不懂寫字的普通人，他們的歷史又如何，又在哪裡呢？<sup>7</sup>

在地方檔案館內，我們可以找到地方文獻，但民間文獻，正如其名，是存在於普通人的生活裡。在生活中，我們創造很多文字記錄，很多是作為憑證之用，也有一些是個人的習慣，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前一類的文獻，目的性比較強，後者則可能是「雞毛蒜皮」的生活細節。但這些材料，都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重要線索。人類學者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在研究點住上一段長時間，瞭解研究對象的生活，掌握他們創造文獻的過程。有時候，人類學者甚至會在當地人的要求下，參與在文獻的創造過程中。<sup>8</sup>但在田野的場境中，每一刻都存在著權力的不平等關係：

官員與老百姓、讀書人與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平民、懂得文字、明白世界趨勢、國家制度的研究者與被研究的普通人。因此每項文獻的創造，都是在權力脈絡中產生，而文獻背後都盛載著複雜的權力關係。所以在獲得文獻的時候，我們更希望知道這些文獻背後的權力關係與結構。

我們每天都在創造文字記錄，而寫下的文字，都有可能成為歷史檔案。但每個年代的文獻都有其書寫的傳統，不是簡單的胡亂撰寫，因此要明白內容格式，便要有歷史學的訓練及考古學家的偵探心態。民間文獻種類繁多，有些很有價值，如地契、屋契、鬮書（分家書）、賣身契等，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東西，也是收藏家的收藏對象。但很多時候，當文獻失去了憑證的價值後，物主視之無用，棄之如垃圾，最後在雜價攤裡出現，而當中的偶然成為研究者的原始資料。例如從東南亞寄回南中國的「僑批」，本來只是附在匯款單中的簡單書信，但當大家都收集用來分析當時的社會的時候，就變得奇貨可居了。

由於研究的需要，我們會用文字或影音器材的幫助，將這些地方生活和風俗習慣記錄下來。當然，這些都是研究者的研究材料，用來撰寫文章，因此這些材料都會被存於研究者的抽屜裡。但到有一天，當研究者不再以之作為研究題材時，便可能會成為歷史記錄的檔案。所以，我們這些田野研究者，都成為了刻意的檔案創造者。

為了進一步表示對田野與文獻研究的重視，2006年開始，我們採用《田野與文獻》作為《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的刊物名稱。近年互聯網的發展，讓我們的《通訊》能在網上同步出版，全球讀者都可以在同一時間閱讀。到今天，我們的《通訊》也成為了一份有20年歷史跨度的檔案。在此期望大家繼續跑田野、看檔案、寫文章、支持《通訊》的出版。

## 註釋

- <sup>1</sup> 程美寶，〈羅香林早年人種學與民族學的理念與實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8卷，第6期（2008），頁82-93。
- <sup>2</sup> 有關科大衛教授進行新界口述史計劃之過程，參看他的文章：〈告別華南研究〉，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9-30。
- <sup>3</sup> 《新界文獻》，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計劃，1983。
- <sup>4</sup> 本文論及之新界口述史計劃、高流灣研究計劃及華南研究的發展過程，蔡志祥教授之文章有詳細論述：〈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頁1-8。
- <sup>5</sup> 有關Barbara E. Ward的論著，參看Barbara E. Ward, *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Mostl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馮承聰等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
- <sup>6</sup> 「華南研究會」的前身為「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該會於1994年出版《華南研究》，第1期。
- <sup>7</sup> 廖迪生，〈文字的角色：在香港新界的一些田野研究經驗〉，載盧惠玲、張兆和編，鄧聖時輯，《書寫屏山：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表述本土歷史文化傳統文獻彙編》（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3），頁i-viii；另載於《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13，第70期，頁10-13。
- <sup>8</sup> 廖迪生，〈田野中的「歷史」：人類學的經驗〉，載末成道男、劉志偉、麻國慶編，《人類學與「歷史」：第一屆東亞人類學論壇報告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159-166。

## 關於《通訊》文體的一點淺見

程美寶  
中山大學歷史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一期是在1995年10月出版的，那時雖然還不至於要用剪刀漿糊貼的方式排版，但所謂的「印刷」不過就是用影印機包辦。技術雖然簡陋，但這第一期開創了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每期內容大體包括機構資訊、讀史笱記、田野考察報告、資料介紹等各類，文章大多短小精幹，言簡意賅。其後經費稍見寬裕，電腦處理文字技術越加普及，加上《通訊》多了一個更正式的名字曰《田野與文獻》，部份稿件篇幅冗長，註釋繁多，幾有「論文化」的傾向，愚以為，這應該不是出版《通訊》的初衷。《通訊》既為「通訊」，文體形式應該多樣活潑，笱記隨筆應該多一些，心得發見應該發揮得隨意一點，才能使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永葆青春，生氣盎然。偶讀顧頡剛隨筆，謂曾規其研究生曰：「自五四運動以來，學者群作論文，以全力解決某一問題，筆記之調不彈久矣。然論文篇

幅長，易生蕪累，蓋立一系統，有不得不加鋪張者，既未處處作深研，自必不能無可擊之瑕。學者自當先從筆記下手。筆記者，或長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簡潔之美。其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記錄人言；其態度可以嚴肅，亦可以詼諧，隨意揮灑，有如行雲流水，一任天機，此學界之小品文也。學者誠當求大成，勿自安於小品，然初學畫者必以一山一石始，稍久，胸中具丘壑，然後漸進而為巨幅，事豈可以躡等。故為筆記既多，以之匯入論文，則論文充實矣；作論文既多，以之灌於著作，則著作不朽矣。」

諸君如有偶見，何不在《通訊》塗鴉，以筆記入論文，再投稿《歷史人類學學刊》，最終以論文灌鉅著？謹為學刊嵌入廣告，並以上引顧頡剛文共勉。

### 活動消息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雲南納西族的  
語言和神話**  
語言學習和資料記錄

黑澤直道教授（國學院大學）

日期 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401室  
語言 普通話

查詢 電話 2358 8939 電郵 schina@ust.hk 網址 schina.ust.hk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 運河上的古橋——以紹興龍華橋、廣寧橋為例

蔡彥

浙江省紹興市圖書館

近代周作人在其《河與橋》中說「（紹興）城中多水路，河小劣容舸。曲折行屋後，合櫓但用篙。約行二三里，橋影錯相交。既出水城門，風景變一朝。河港俄空闊，野板風蕭蕭。」<sup>1</sup>道出了紹興河道縱橫，舟車如織的水鄉風情。據1993年統計，紹興全市有橋10,600多座，橋樑的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座，為全國之最，故被譽為中國「萬橋市」和「橋樑博物館」。2014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將中國大運河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紹興段被列入世界遺產的點段共有3處，即八字橋、八字橋歷史街區和紹興古織道。

## 一、水鄉和運河演變

大運河紹興段是其中一條重要水道。它以紹興城為中心，向西經柯橋至錢清出境，向東經皋埠、陶堰至曹娥江，而後分為南北兩線，北線經百官、驛亭至五夫長壩出境，南線經梁湖、豐惠至安家渡出境。早在春秋時期，越國在建都紹興同時，便開鑿了人工運河「山陰故水道」。西元前490年，即東周敬王勾三十年，越王勾踐七年，在勾踐回國的當年，就命大夫范蠡利用今紹興城所在的八個孤丘，修建小城。據《越絕書·卷八》：「（城）週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隨即又在小城以東增築大城，就是今天的紹興城。同書載「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山陰故水道」的開鑿應該不遲於這一時間。又說「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sup>2</sup>可見早在春秋時期，運河兩岸就已經是一個聚落中心。運河橋樑的修築當開始於這一時期。到西晉永泰元年（307），會稽內史賀遁開鑿西陵運河（後稱西興運河），使大運河紹興段基本成形。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七》：

運河自西興抵曹娥，橫互二百餘里，歷三縣。蕭山河至錢清長五十里，東入山陰，逕府城中至小江橋，長五十五里，又東入會稽，長一百里。其縱，南自蒿壩，北抵海塘，亦幾二百里。《舊經》云：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雖旱不涸，至今民飽其利。<sup>3</sup>

《舊經》就是編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的《越州圖經》。這次修築，奠定了運河穿紹興城而過的格局。南宋時，統治者對運河的整治更加重視，形成「堰限江河，津通漕輸，航甌舶閩，浮鄞達吳，浪槩風帆，千艘萬艫」<sup>4</sup>的宏大漕運體系，也使紹興成為全國交通發達、經濟繁榮和文化燦爛的「海內劇邑」。

## 二、龍華橋、廣寧橋與士紳

八字橋歷史街區位於紹興城東北部，北鄰勝利路，南至紡車橋，西臨中興路，東靠東池路，運河橫穿中心。總面積0.3平方公里，其中街區佔0.2平方公里，是我國納入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僅有的兩個街區之一。

沿著都泗門路，盡頭為丁字河。其河南接運河，北至東大池，東西橫跨一橋，這就是龍華橋，也是目前紹興城僅存的明代閘橋，紹興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龍華橋為抬樑式，單孔。長5.5米，寬2.9米，高4.3米。西面踏道緊貼龍華寺牆壁呈南北向。橋北側，沿河立有二根石槽，高3.8米，寬0.5米，是為閘門遺址。橋墩用條石砌築，中間鑲《龍華寺東閘橋碑》，敘述了募修龍華橋經過和捐建者姓名，表明該橋重建於明崇禎三年（1630）七月，共耗銀68兩4錢，距今約四百年。龍華寺東閘橋

碑，直3尺2寸，橫1尺3寸，全文如下：

龍華寺東開橋一座，相傳為趙福王所創建，以資灌溉。語具東府東坊土穀祠碑記中。日久漸圯，居民□□等發心置簿，募緣重建。□□居士。

□月十八日興工，逾月告成，煥然一新。往來普渡非復舊日簡陋之象矣。今將善信喜舍銀數，詳開左方，以志不朽。

一女眷。商門太夫人劉氏拾兩。商門祁氏貳兩。王門商氏壹兩。朱門商氏壹兩。商門祝氏伍錢。  
一士民。商周祚拾兩。商周初貳兩。祁彪佳貳兩。王璵貳兩。柴雲漢壹兩伍錢。王燈壹兩。黃希達壹兩。吳邦輔壹兩。張萼壹兩。劉官壹兩。劉寅壹兩。劉宓壹兩。劉寧壹兩。劉世祝壹兩。劉世益壹兩。商維治壹兩。商維源壹兩。商周祐壹兩。商周祺壹兩。商周初壹兩。商念祖壹兩。商似祖壹兩。商紹祖壹兩。萬訥壹兩。張賢臣壹兩。唐應科壹兩。董用中伍錢。劉士璵伍錢。劉宏伍錢。商周祥伍錢。商周祐伍錢。商周禪伍錢。商周鼎伍錢。商周彝伍錢。商周胤伍錢。商光祖伍錢。王毓蘭伍錢。王毓著伍錢。朱曾伊伍錢。朱曾萊伍錢。□□褒伍錢。劉宰三錢。劉宗三錢。沈應鳳三錢。趙崇曾貳錢。鄺雲程壹兩伍錢。吳應春壹兩。□□壹兩。魯應朝壹兩。景星耀伍錢。凌鳳翽伍錢。王萬化三錢。

石工華朝甯、朱惟龍、鄭維先仝造。

皇明崇禎三年歲在庚午七月吉立。

碑文中所提及的趙福王，就是趙與芮。據清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一》：

宋福王府。在東府坊。宋嘉定十七年（1224），理宗即位，以同母弟與芮奉養王祀，開府山陰叢山之南。府東大池，其台沼也。<sup>5</sup>

據上碑，修建龍華橋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東大池水位。那麼，龍華橋的初建年代，也應該在此時，即南宋理宗在位期間（1224-1264）。

閘橋亦稱為橋閘。雖然閘和橋都是水上建築，可原本的功能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橋，通水而上下行；閘，有門，用來阻擋或控制水流。而閘橋正是將這兩種不同功能的建築組合起來，既可排洪擋潮，蓄水灌溉，又便於人畜通行，車輛運輸。在紹興，閘橋與斗門常混稱。東漢時，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築鑿湖湖堤時，建造了「三大斗門」，創造性的把閘與橋結合在一起。紹興造橋歷史之悠久，可見一斑。南宋慶元年間（1195-1200）會稽縣尉徐次鐸《復湖議》中提出「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為泄水，均也。泄水最

多者曰斗門，其次為諸堰，若陰溝則又次焉」。斗門與閘的最大區別在於，斗門的板是直放的，閘板是橫放的，所以斗門一開，泄水最快，而閘可以通過增減閘板數量來控制流量，保持一定水位。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紹興著名的還有三江閘橋。它始建於唐大和七年（833），明嘉靖十六年（1537）重建，因橫跨錢塘、錢清和曹娥三江而得名。橋全長108米，寬9.16米，高10米，依峽而築，用巨石砌成，每層每塊大石之間均有榫卯銜接，最底層與岩層合卯，並灌注生鐵，石縫用灰秣膠合。該橋共28個洞閘，分別以28星宿名稱編號，故又名「應宿閘」。1963年被公佈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碑文中所提及的商周祚，字明兼，號等軒，會稽人（今紹興）。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授邵武縣令五載。入京，累官太僕寺少卿。萬曆四十八年（1620）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他在任期間不動民間一錢，設法支應王事；擒斬巨盜，抗擊紅夷侵擾，故離任之日，閩人為之立祠。明天啟五年（1625），再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翌年，升兵部尚書，以母年老，請告歸養，里居十載。據《越中雜識》一書



八字橋條：「明塚宰商周祚宅在橋西」。<sup>6</sup>崇禎六年（1633）商周祚撰〈水澄劉氏家譜序〉：

聖經稱：治國平天下而必先齊家，豈家屬身外之物。……祚之先贈君屬劉門館甥，母太夫人生祚于外家，受外大父太素公鞠育教誨之恩，欲報罔極，追溯所自，劉固水木本源也，於大京兆序為中表兄弟，少同應童子試，同舉於鄉，同登進士，同朝且三十年。大京兆為理學節義宗主，鄉邦交重，祚自愧庸劣，而嚮往之誠，雖屬孰鞭，所忻慕焉。<sup>7</sup>

〈譜序〉署名為「崇禎乙亥孟夏，賜進士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商周初，駿骨權奇，鳳毛絢麗，自為諸生己興，而兄大司馬祚，競爽連辟，而良工戒于示朴，大音尚其希聲。雖鴻雁異時，而塤箎終合。朕龍習飛榜，葉應昌期，妙選四科，寄之百里。蓋廉足以勵俗，敏足以任繁；斷以決疑，慈以息物，商城得爾，民其廖乎。……王祖父、祖父及爾兄俱以甲科騰光竹帛。爾牽絲筮仕，即徵殊典貴於所生，爵而後官不俟。

勅曰：風雨之感，糟糠之助，士之所不能忘也。……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商周初之妻張氏，家為聖女，歸稱淑媛，養不迨□，言每懷於屬，續瞻則有母事。罔怠於承歡，膏火相助，絲麻勵儉，敦娣姒之，好鞞若棠花。……一任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二任兵科給事中。三任海南提學兵巡道廣東按察司僉事。四任常鎮兵僕道湖廣布政司右參議。

崇禎元年十月□日。

刻碑時間在明崇禎元年（1628）十月。《誥命》稱讚商氏一門堪為「諸生己興」，淑媛榜樣。修橋當在此後。在57位捐銀者中，商氏一族佔22位，其中5位「女眷」捐銀14兩5錢，佔總數五分之一強。作為積善人家，商周祚和商周初兄弟帶頭捐資，不僅激勵了外人，更給族人莫大鼓舞。所謂「志不朽」，實際上就是紹興士紳歷代相沿的治水傳統。「如遇大路、橋樑、要津往來的，或倡率修造，或獨立完成。」<sup>9</sup>民國《紹興縣誌採訪稿》就將修橋排在〈義舉〉第二位。

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號世培，山陰人（今紹興）。明天啟二年（1622）

第、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郎奉敕參贊機務予養，前戶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兩奉敕巡福建地方、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外甥商周祚頓首謹序」，此時他尚在「里居」期間。商周祚認為治國必先齊家，重「鄉邦」，因此帶頭捐資重建龍華橋，還辦學、賑災，著實為地方辦了不少好事。直到明崇禎十年（1637）才起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崇禎十一年（1638）五月，任吏部尚書。「復職四議，皆民聲起」。<sup>8</sup>由於剛正不阿，屢違聖意而丟職歸里。

今紹興圖書館藏有民國拓商周祚兄弟《商周初誥命碑》，對於瞭解他的家族概況是有益的。

《商周初誥命碑》，直3尺8寸，橫3尺5分，全文如下：

進士，曾任福建都御史、蘇松巡按等職。明亡，祁彪佳恪守「忠臣不事二主」節義，自沉於寓園梅花閣前水池中。南明朝廷追贈其為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清乾隆朝追諡「忠惠」。為建龍華橋，他捐銀2兩。祁彪佳之父祁承燾，為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參政。他一生嗜書成癖，創立「澹生堂」藏書樓，藏書10萬餘卷，多為善本、孤本，其數量之多、規格之高，堪和寧波天一閣媲美，在我國圖書館史上有一席之地。祁彪佳與商周祚是翁婿，其妻商景蘭，字媚生，會稽人。她是商周祚長女，能書善畫。據《兩浙輞軒錄·卷四十》：夫

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詩。每暇日登臨，則令媳女輩載筆床一硯匣以隨，一時傳為盛事。<sup>10</sup>著有《錦囊集》等，是明清為數不多的女詩人之一。

龍華橋西，有一東晉古寺龍華寺。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十一》：

龍華寺在都泗門內，即陳江總避難所憩也，俗呼龍王堂。江總修心賦並序：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蒞此邦，卜居山陰都賜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居，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摠鬱結，庶後生君子，閱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秘。表《檜風》于韓什，著鎮山于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鑄暴秦之狂字。太史來而探穴，鐘離去而開筭。信竹箭之為珍，何珉珠之罕植。奉盛德之鴻祠，寓安然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園，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層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浸淫。掛猿朝落，饑鼯夜吟。果叢藥苑，桃溪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遑回，面江源之重選。流月泛之夜迴，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俯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邇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造，樂樹扶疏。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鐘風雨之如晦，倦雞鳴而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抑四辨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遺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于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而可已。<sup>11</sup>

龍華寺在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447），由吏部尚書江夷初建。夷父江彪，東晉永和中（345-356）任會稽內史，卜居山陰都賜里。後捨宅為寺。其七世孫江總於南朝梁太清年間（547-549）避難會稽龍華寺，撰《修心賦》敘述寺中的清幽景致：「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曉修經成，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據《越中雜識》一書：「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侯景寇京師，台城陷，總避難會稽，憩於龍華寺。後入陳，為僕射尚書令。今蕭山有江丞相祠，人作江淹，誤。」<sup>12</sup>站在寺內遠望會稽山，四周綠水環繞，風景絕佳，故民間將這一帶通稱為「龍王堂」。進入民國，龍華寺仍在（表一）。據民國二十年（1931）尹幼蓮《紹興街市圖》和民國二十二年（1933）紹興縣政府建設科測繪五千分之一之比例尺《紹興城區圖》所繪，是時寺、橋相印的景觀還存在。

據記載，寺內的彌勒佛像為戴顓的作品。

戴顓（385-448），字仲者，譙郡銓縣人（今濰溪）。父逵（326-396），字安道。父子二人同為東晉南朝時期的藝術家，尤其擅長雕塑佛像。據《剡錄》記載：逵有清操、性高潔。善圖畫，巧丹青。慕剡地山水之勝，攜子隱居剡縣。王子猷雪夜乘小舟訪戴，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這就是典故「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由來。戴顓在巨大佛像的製作上，有豐富的經驗。一次，他看到吳郡紹靈寺的丈六釋迦金像過於古樸，於是「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sup>13</sup>使比例更加勻稱。戴顓與江夷是朋友。

民國，紹興佛教會曾設於此。抗戰期間為免遭日寇搶奪，南朝齊維衛尊佛造像從開元寺被移到寺內保護。佛像背面刻有「齊永明六年太歲戊辰于吳郡敬造維衛尊佛」18字，這是研究我國南方佛教造像的重要實物。文化大革命期間，龍華寺被移作他用。2005年按照「修舊如舊」原

則，利用老的廊柱、地磚、門檻重建了大雄寶殿、天王殿和寮房，恢復了歷史上龍華寺的盛況。寺內現存清嘉慶辛酉（1801）年《重建龍華寺碑》，明確提到龍華橋和廣寧橋。

廣寧橋在龍華橋西，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國內最長的一座七折邊拱橋。折邊拱是一種特殊的橋型，處於從梁橋向弧邊拱橋演變的過渡階段。橋拱下有纖道，將橋基石挑出0.7米，供繡夫拉纖時行走，也可供人通行。橋上橋下二條道路，廣寧橋堪稱古代立交橋。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

廣寧橋，在長橋東。漕河至此頗廣，屋舍鮮少，獨士民數家在焉。宋紹興中，有鄉先生韓有功復禹，為士子領袖，暑月多與諸生納涼橋上。有功沒，朱襲封亢宗追懷風度，作詩云：河梁風月故時秋，不見先生曳杖游。萬迭遠青愁對起，一川漲綠淚爭流。蓋橋上正見城南諸山也。襲封，亦修潔士云。<sup>14</sup>

漕河就是大運河。韓有功是當時紹興「士子領袖」，「河梁風月」、「一川漲綠」說的是運河流經廣寧橋的情形。這段話告訴我們，廣寧橋在南宋嘉泰年間（1201-1204）已有，而且是一處重要的觀景納涼公共活動場所。據明萬曆《紹興

府志·卷八》：

廣寧橋。在都泗門內。漕河至此頗廣，屋舍鮮少，獨士民數家在焉。橋上正見城南諸山。宋紹興中，有鄉先生韓有功復禹，為士子領袖，暑月多與諸生納涼橋上。有功沒，其徒朱襲封亢宗作詩懷之。朱亦修潔士云。隆慶中，漸圯，華嚴寺僧性賢募緣重修。朱亢宗詩：河梁風月故時秋，不見先生曳杖游。萬迭遠青愁對起，一川漲綠淚爭流。<sup>15</sup>

華嚴寺在紹興城內，建於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到了明隆慶年間（1567-1572），廣寧橋由華嚴寺僧性賢組織重修。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廣寧橋。今測橋長60米，寬6.9米，高5.99米。拱高4.2米，寬3.58米，跨徑6.25米。拱券為縱向分節並列築砌。龍門石飾以圓獸，堅立一排。這些獸面中雕刻的龍是三爪龍，三爪龍為宋以前風格，此石雕圖案可證明該橋始建時間應在宋之前。整個橋身用塊石疊砌，兩側置須彌座狀實體石欄，間立覆蓮墩石望柱，欄末置抱鼓石收結。南、北各有23檔石階，條石鋪就。每級長3米，厚0.12米，寬0.5米。

廣寧橋北立有明商廷試撰《重修廣寧橋碑記》，直6尺1寸，橫2尺1寸：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行太僕寺卿邑人商廷試撰文。中實大夫太常寺少卿管尚寶司事謝敏行書單。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西楚明郡前川邵雲南清吏司郎中葉應春篆額。嘗聞橋樑：王政之大事也。老怯溪橋，不惜千金之費，窮臨野渡，應遣一生之愁。昔人所詠，良有以也。矧作邑建邦，必標山川之會；行人利涉，每當水陸之冲。廢隧允藉於作新幹濟，必資于才力。是故垂虹應星，有光與圖，回障川，式增形勝，而可不務者乎！吾越古稱澤國，城環四十里，列為九門，水門居其六，皆水道之所經也。其地枕江面山，千岩萬壑，溪澗溝渠之水，匯於鑿湖，而北注于江，其間蕩為巨浸，分為支流，皆經行城堙闡之中，勢不得不為橋樑，以通往來。廣寧橋在邑城最為衝要，南北數百尺，上聯八字橋，東西與長安、寶佑對峙而起，遂以雄壯甲於越中。自創以來，凡幾修築，吾不能記其詳。而重建于宋紹聖四年，則廬普安之志石尚存，迄今將五百祀矣。橋之傾圮殆甚，行道者危之，維時謝蘭阜氏、時鎮山氏、成省白氏，相與倡其議。擇僧之有戒行才幹，如性賢等者，使董其役，則以聞於郡邑之賢士大夫。適紹坪彭公蒞郡事政心，先大體惠存兼列。爰及寮屬龍石王公、儉齊伍公、半野陳公、理齊張公、孺東徐公、星泉楊公皆銳意修舉，各捐俸有差，以為民倡。顧自筮日以至落成，諸大夫咸親蒞之，而士民之好義者，亦知所感發而樂於

輸。故財不衰而集，工不督而勸，盡撤其舊，而一新之。下盤基石，旁築埤塘，罔不堅致鞏固，可垂長久。其工益倍於昔，而費亦不下千金，逾年而告成，亦可謂難矣。橋在予交界，當泗水之會，凡經畫規度多遍訪而行。事成，諸公以記相屬。顧昔人言惟作新之幾振於上，而效勞之力競於下。登是橋者，其無忘所自而已，抑予重有所感焉？廣寧之基址舊矣，宋時福邸於是地即也。為水晶宮行樂其間，朝出廣寧，暮歸長安，遂為貴游繁華之地，若韓處士抱德而隱時，曳杖納涼其上，萬迭遠青，一川漲綠，河梁風月之詠。今繁華之跡銷歇泯滅而不可追矣，而風月之景固在也。好修之士，亦有續前賢之遊者乎！則此橋將以名勝聞於天下，豈徒以利涉而已耶？故為之記。萬曆三年己亥冬十一月至日立石。

商廷試（1498-1585），字汝明，號明洲，會稽人（今紹興）。明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四年（1555）任黃州知府，累官至陝西行太僕卿，致仕歸。《碑記》確認廣寧橋重建於北宋紹聖四年（1097），此前歷史不詳，「在邑城最為衝要。上聯八字橋，東西與長安、寶佑對峙而起。」八字橋在廣寧橋南。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八字橋，在府城東南。二橋相對而斜，狀如八字，故得名。」<sup>16</sup>八字橋是拱樑橋，今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樑下西側第五根石柱，刻「時寶祐丙辰仲冬吉日建」，直3尺2寸，橫5尺1寸。此橋南宋嘉泰間（1201-1204）即存，「寶祐丙辰」（1256）當為重建時間。橋身嵌助石碑，直3尺8寸，橫1尺1寸。刻「信士□□」。長安橋即長橋。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長橋，在城東北支，鹽倉側西。」<sup>17</sup>寶佑橋在寶佑橋河沿。《寶佑橋題字碑》，直3尺8寸，橫1尺1寸。刻「歲峇寶佑癸酉重陽吉日立」。這表明寶佑橋建於南宋寶佑癸酉年，即1253年。今均拆除。《碑記》稱：橋樑為「王政之大事也」。「吾越古稱澤國，勢不得不為橋樑，以通往來。」記敘了明萬曆三年（1575），在僧性善「董領」下，地方官、士民集資整修廣寧橋的熱鬧場面，最後「盡撤其舊，而一新之」。

廣寧橋身帶有明萬曆年間（1573-1620）的多處募修刻石。《廣寧橋石刻》，直3尺9寸，橫9寸。刻「萬曆二年八月□日□舍」。《廣寧橋助石碑》，直3尺8寸，橫2尺2寸4分。刻「會稽縣廿一都章家□，信士章天祥，壽命延。萬曆二年八月」。《廣寧橋洞碑》，直3尺6寸，橫2尺2寸。

刻「山陰縣大善寺，僧善。僧綱司，都綱德。萬曆二年八月」。《廣寧橋信官題刻》，直3尺1寸，橫1尺1寸。刻「會稽縣。信官楊。妻氏。」《廣寧橋信士捐助碑》，直3尺6寸，橫1尺5分。刻「會稽縣石童坊。信士。□氏。」舍、信士和信官都是捐資的意思。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十一》：

大善寺，在府東一里，中有七層浮屠，梁天監三年，民黃元寶舍地，有錢氏女未嫁而死，遺言以奩貲建寺，僧澄貫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賜名大善，屋棟有題字云：梁天監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庚子朔八日丁未建。宋建炎中，大駕巡幸，以州治為行宮，而守臣寓治於大善。及移蹕臨安，乃復以行宮賜守臣為治所。歲時，內人及使命朝攢陵，猶館於大善。幹道中，蓬萊館成，乃止。……明永樂元年，寺僧重修，寺塔復煥然。<sup>18</sup>

僧綱司是明代管理僧人的機構。《明史·職官志》載：府僧綱司。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縣僧會司，僧會一人。府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縣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設官不給祿。<sup>19</sup>明代紹興府的僧綱司設在大善寺內。刻「僧綱司，都綱德」含有見證、勸募的意思。

### 三、橋樑題刻作用

在紹興，橋修成之後，一般要立碑或勒石記其事，詳述建橋始末，或者刻上捐資人姓名及捐資數額，有的還記錄治水心得、管理制度，以鄭重其事，昭示後人。舊時對立碑之舉極為重視，一些碑文往往出自名士之手，成為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運河在紹興城內尚存光相橋、小江橋等數座古橋。光相橋在北海橋直街。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光相橋，在城西北」<sup>20</sup>。《光相橋荷花石柱題字》，直2尺2寸，橫9寸。刻「隆慶元年。吉日重修。」《光相橋題刻》，直3尺2寸，橫1尺1寸。刻「□有光相橋，□頽圯，妨礙經行□。今自備己資，鼎新重建，光相洞橋，意圖永固。歲辛巳至正□年吉立。□石匠丁壽造。」至正是元惠宗的年號，即西元1341-1368年。光相橋的修築形式為獨立捐修。

小江橋在蕭山街口。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小江橋，在城東北」。<sup>21</sup>清乾隆《紹興府志·卷十四》：「《山陰縣誌》：在江橋邊，故以小名」。還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江橋，在府東北二里許。《寰宇記》引《山陰記》云：江橋乃宋江彪所居之地，因以名焉。今郡人以為江文通故居」。<sup>22</sup>橋南立有「永作屏藩」石碑一塊，直5尺6寸，橫2尺。據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八》中〈貽紹興太守張椿山書〉：

越郡為澤國，城中河流眾橫，界畫若棋局，其闊處可並三艇，狹處僅容舟。自昌安門入，由斜橋之小江橋數十武為城河孔道，兩岸列市肆，貨船填集，載者卸者鱗鱗然，每擁阻竟不能通。惟飭一誠實小官，查丈附近河身，有稍寬者押令空船分泊各岸，不得聚此一處，嚴禁迭泊，仍不時往查。又立禁碑，大書深嵌小江橋下，永垂厲禁。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清容、若生，號藏園，江西鉛山（今鉛山）人。清乾隆二十二年

（1757）進士。主講紹興蕺山書院。立碑的目的是要大小船隻「分泊各岸」，保證河道暢通。

### 四、「士大夫親蒞，士民樂於輸」的傳統

對於紹興城河網的形成和橋樑的修築，明王士性分析說：

紹興城市，一街則有一河，鄉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設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動費官帑數十萬，而當時疏鑿之時，何以用得如許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地本澤國，其初只漫水，稍有漲成沙洲處則聚居之，故曰菰蘆中人。久之，居者或運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溝瀆種藝，或浚浦港行舟往來……故河道漸成，甃砌漸起，橋樑街市漸飾」<sup>23</sup>

有河必有橋，橋樑的歷史與人類活動密不可分。在紹興民間捐資修橋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在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所列出的240座橋樑中，明確官修的6座，獨立捐修的28座（表二）；明萬曆《紹興府志·卷八》所列出的64座橋樑中，明確官修的4座，獨立捐修的27座（表三）。大多數橋樑屬於民間集資修築。現存龍華寺東閘橋碑、重修廣寧橋碑記和廣寧橋題刻都印證了民間力量在運河橋樑修築上的作用。

宋代以後，橋樑的類型更加豐富多彩。單從結構上看，就有索橋、浮橋、梁橋、拱橋、浮樑結合橋、拱樑結合橋和堤樑結合橋等不同形制。不少樑橋、拱橋，有的立亭、有的建廊，成了亭橋和廊橋。拱橋橋形從初始的伸臂梁橋、折邊形拱橋，發展到弧邊形拱橋和懸鏈線拱橋。在功能上也逐漸多樣化。首先，橋上設市成為一種常見的做法。隨著經濟發展，商業繁榮，處於交通要道的一些橋樑，成為當時的交易之所。如「府城內府橋，在鎮東閣東。《寶慶志》云：舊以磚斲，不能堅久，守汪綱乃盡易以石。橋既寬廣，翕然成市」<sup>24</sup>。其次，橋上立祠設龕，朋友聚會，成為大眾活動和交際場所。如「山陰杜浦橋，在

府城西北十五里漕河傍。《嘉泰志》云：自此而南，煙水無際，鷗鷺翔集。過三山，遂自湖桑埭入鏡湖」<sup>25</sup>，成為文人集會場所。第三，有些橋樑兼具水利功能。橋上行人，橋下設閘。

### 註釋

- <sup>1</sup>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86。
- <sup>2</sup> 袁康、吳平，《越絕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頁191。
- <sup>3</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明萬曆十五年〔1587〕刻本），卷7，頁14。
- <sup>4</sup> 王十朋，《會稽三賦》（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風俗賦，頁2。
- <sup>5</sup> 李亨特，《紹興府志》（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卷71，頁7。
- <sup>6</sup> 悔堂老人，《越中雜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7-8。
- <sup>7</sup> 劉宗周，《水澄劉氏家譜》（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序〉，頁3。
- <sup>8</sup> 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民國二十八年〔1939〕鉛印本），〈人物〉，頁95。
- <sup>9</sup> 周炳麟，《公門懲錄勸》（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儀征有福讀書堂重刊本），附錄，頁12。
- <sup>10</sup> 阮元、楊秉初，《兩浙輶軒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卷40，頁2884。
- <sup>11</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7，頁9。
- <sup>12</sup> 悔堂老人，《越中雜識》，頁134。
- <sup>13</sup> 釋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3，頁463。
- <sup>14</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卷11，頁21。
- <sup>15</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8，頁33。
- <sup>16</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sup>17</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sup>18</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4。
- <sup>19</sup>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75，頁1236。
- <sup>20</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3。
- <sup>21</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sup>22</sup>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3。
- <sup>23</sup>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頁72。
- <sup>24</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31。
- <sup>25</sup>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34。

表一、紹興縣佛教寺院庵堂一覽表（部份）

名稱	地址	重建時代	住持人 (僧尼或 俗家)	公建募建或私建及建修 人或重修人姓名、時代	屋中間數	玉石器、銅佛像尊 數及藏經古物、名 人之碑記刻聯	採集所自
龍華寺	都泗坊 廣寧橋 下	嘉慶辛酉 (佛教會 載乾隆)	僧達慧	陳維信助石柱，民國丁 巳。宋陳氏助枱桁，光 緒廿四年重修四天王殿	二十餘間，後 有園		俞大可、童 穀幹

資料引自：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紹興縣誌資料第二輯》（稿本），宗教，頁10。

表二、南宋嘉泰《會稽志》所載橋樑

	總計	府城	山陰	會稽	蕭山	諸暨	餘姚	上虞	嵊縣	新昌
總數	240	99	28	33	9	13	20	22	13	3
其中官修	6	2		1		1		2		
獨立捐修	28	17	1	1	2	1	3	3		

表三、明萬曆《紹興府志》所載橋樑

	總計	府城	山陰	會稽	蕭山	諸暨	餘姚	上虞	嵊縣	新昌
總數	64	19	8	9	3	3	10	6	3	3
其中官修	4	1				2	1			
獨立捐修	27	9	2	2	2	1	5	5	1	

##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之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辦

###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30期）

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



廣州市南沙區  
南沙資訊科技園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

研究班每年舉辦二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  
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論文報告人參加辦法  
○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其本人學位論文。  
○請於2015年10月17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楊培娜收 ( yangpeina@mail.sysu.edu.cn ) 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榮收 ( schina@ust.hk )  
○提綱內容：  
1. 學位論文題目；2. 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 論文各章節簡介；4. 參考書目。  
○主辦機構負責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高鐵二等座席)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  
○主辦機構將於10月31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日期。

●參與研討班者報名辦法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  
○主辦機構負責參與者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  
○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  
○請於2015年10月31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  
以電郵同時送 yangpeina@mail.sysu.edu.cn 及 schina@ust.hk 。

●查詢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電話：(020)84114831 傳真：(020)84112122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31758145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 大埔元洲仔大王爺誕考察報告

趙惠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香港社區的宗教活動不僅是宗教信仰活動，通過一系列酬神儀式與活動，除可團結社區內部，重新確定成員的資格，活動更將不同層次的地緣組織及社會結構呈現出來。

## 一、元洲仔地理

元洲仔位於吐露港西北，大埔林村河口附近，昔日原為一個小島。鄰近是新界東部的重要墟市——新墟和舊墟。而1940年代設立的大埔漁市場亦在其旁邊（位於運頭角海旁東昌街萬四長園側）。吐露港是新界地區與粵東地區的重要水路運輸網絡，這運輸路線直至1960年代才衰落。<sup>1</sup>吐露港一帶海域，群山環抱，水質優良，1950年前是一處優良的漁場，盛產九棍、牛鰵等魚類，還有帶子及海膽。因此，元洲仔成為本地和海陸豐漁民泊船的灣頭。兩個族群無論在語言上、生活方式和作業方法皆有很大差別，所以成為兩個獨特的群體。其中來自海陸豐的鶴佬漁民，他們祖籍惠陽的澳頭及下涌等地，所用方言屬閩南語系，俗稱為鶴佬話。海陸豐漁民多以圍罟、照魚及吓門鱸等方式捕魚，他們會將捕得的漁獲拿到大埔漁市場售賣。此外，海陸豐漁民早期亦有從事運輸工作，運輸的貨物有海鹽、鹹魚及海味等，回程則運木材。這類船當地人稱為「石火船」，海陸豐話稱為「烏卡」。<sup>2</sup>

1950和1960年代，大量漁民聚居於元洲仔，漁民居住在艇上或棚屋。由於居住環境擠迫和衛生情況惡劣，備受各方關注。<sup>3</sup>1964年船灣淡水湖主壩工程動工，在吐露港北岸建造全港第一個淡水湖，面積達1,215公頃。1974年，政府在吐露港北岸、元洲仔以北展開大埔工業邨工程。兩項工程皆導致吐露港漁獲數量大減。1976年政府宣佈發展大埔新市鎮。<sup>4</sup>在新市鎮計劃下，元洲仔外圍

海域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元洲仔漁民逐漸被遷徙到其他地方或屋村。

## 二、大王爺誕背景

大王爺為海陸豐漁民的庇護神。大王爺廟位於現今元洲仔公園以南和吐露港高速公路北側之間。本來是一個細小社壇，以鋅鐵蓋搭，原位於元洲仔島上北面，何時建成已不可考。被颱風摧毀後，於現址重建。

據2015年《大埔元洲仔籌建會所暨重修大王爺廟紀念特刊》所載，大王爺是瘟神系統中的大宗。唐太宗年間，有三人赴京應考，途經某鄉，因知井中有瘟毒而捨身投井，令鄉人因此免於疫毒，太宗因他們捨身救鄉民，賜他們三人為千歲，封其為神祇，後世人設壇奉祀。大王爺神壇，始於何時無從稽考，原設於元洲仔山之北面，僅豎一碑祭祀，以表敬神，在百多年前再由蘇、李、徐、鍾、石五姓漁民，發起募捐，遷到現址。

另一說法是某年颱風後，有漁民在海邊拾得木製神像，後核實為大王爺，故建廟供奉。最初廟宇非常簡陋，後來因為信奉的人越來越多，香火鼎盛，於是在原址重建廟宇。初時演木偶戲賀誕，其後信眾生活水平提高，便在廟前搭建戲棚邀請名伶公演粵劇賀誕。<sup>5</sup>誕期一般在農曆五月至七月期間舉行。<sup>6</sup>在1955及1956年《大公報》皆曾報導元洲仔大王爺廟賀誕活動。1956年大王爺廟賀誕更邀得新界民政署署長彭德主持剪綵開幕。<sup>7</sup>

據元洲仔漁民鍾偉強<sup>8</sup>稱，在中國政權易手後，海陸豐漁民因為知悉有不少同鄉住在元洲仔，所以紛紛來到元洲仔。他們大多住在船上，有些住在棚屋。<sup>9</sup>在1950年代，由元洲仔至現時王肇枝中學等地方皆建有棚屋。1960年代，因為政



府要改善居住環境，部份漁民被遷往下坑新村或光頭山的愛德華新村居住。<sup>10</sup>1966年，因興建船灣淡水湖，漁業作業範圍減少，漁獲銳減，部份漁民因生計困難，有些轉往從事海魚養殖業，有些則改業從事塑膠花加工，或體力勞動的工作，但仍住在漁船上。<sup>11</sup>徐傑文指出，在1970年代末，因為政府發展大埔新市鎮，建吐露港公路，需全面清拆元洲仔漁民棚屋和公眾地帶，漁民被遷徙到富善邨臨時安置區，其後被安置在大元邨、太和邨及廣福邨等地。亦有部份人留居在沒有被清拆的美援新村，而大王爺廟亦留守原址。在富善邨未建成之前，信眾在富善安置區搭棚恭賀大王爺誕。<sup>12</sup>富善邨建成後，由於沒有廣闊的地方可供搭建戲棚，於是改在較多海陸豐漁民居住的大元邨和太和邨之間的大埔天后宮前的風水廣場搭建戲棚，由「慶祝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聘請戲班演戲賀誕。

### 三、組織、經費來源及開支的大概情況

根據《乙未年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特刊》（下簡稱《特刊》）所載，委員會有主席1人，副主席5人，總理1人，副總理5人，財政主任1人，總務17人，值理部首<sup>13</sup>241人。

一個節誕活動需要鉅額支出，必須社區內眾人捐款支持。據徐傑文指，在60年前，元洲仔海陸豐漁民在籌辦演戲時，按五姓姓氏比例選出委員，當中蘇氏7人、徐氏6人、李氏6人、鍾氏3人和石氏3人。徐傑文父親退位後由他接掌其父的職位，若他不出任該職位，也多由他們的直系親屬接任；而主席，總理，財政主任職位由部首投票選出。此外，五個姓氏也有一人出任副總理一職和副財務主任一職；而值理部首，每人有一本簿，簿內多是其家人或親屬名字。值理部首負責向其簿內登記的丁口收集丁口錢，以2015年為例，每人須定額資助70元。每位捐助者可獲得大會贈送戲票。此外，每個部首均可以獲贈兩張戲票和一包一斤重的平安米，若一戶超過十人可多得兩張戲票。

在賀誕會場臨時辦事處<sup>14</sup>貼有通告列明2015年該誕截至6月22日的收支狀況。是年總收入

約1,084,770元，總支出約1,085,060元。共收12,657人丁，每丁70元，共丁口錢885,990元，13個花炮會<sup>15</sup>炮金共65,000元，大王爺廟善信15,580元，儒釋道功德同修會70,200元，加上賀誕期間大王爺殿每天萬多元的香油錢，合共收入1,084,770元。此外，還有附近及友好村落和組織的捐助，寶誕特刊刊載佛教長霞淨院捐助15,000元、豐源地產10,000元、大埔鄉事委員會4,000元、大埔七約鄉公所3,000元、大埔社團聯誼會3,000元、大埔聯益鄉3,000元、大埔舊墟天后宮3,000元、帝記海鮮3,000元、文春輝<sup>16</sup>2,000元、大埔商會1,500元等。總支出包括搭建戲棚440,000元、粵劇團團費395,000元、惠海鴻利職業白字戲劇團<sup>17</sup>團費113,800元、戲棚帶位及保安費用100,000元，保安酒水3,200元、大會汽水及水3,260元等支出。由委員會統理各項收入和支出費用。

《特刊》所載的各界友好贊助名單，可見地方社會聯盟關係。與主辦單位關係最好的是儒釋道功德同修會和大埔鄉事委員會；其餘組織捐款3,000元，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文春輝捐款2,000元。其他以個人名義捐助的還有大會榮譽會長梁官華<sup>18</sup>、陳笑權<sup>19</sup>及張國棟<sup>20</sup>等。而大會總理蘇馬俊和副總理蘇來是大埔聯益鄉委員。「聯益鄉」是由大埔頭、南坑和新圍仔等村落所組成，以大埔舊墟天后宮為祭祀中心。大會總務鍾偉強是現屆大埔鄉事委員會總務組主任。大會主席蘇志強是大埔社團聯誼會副主席和大埔舊墟天后寶誕演劇花炮會副會長。

### 四、會場佈局

此次寶誕會場設在大埔墟天后廟<sup>21</sup>前的風水廣場，戲棚可容納1,500人，戲棚面對大埔舊墟天后宮。戲棚前是用竹搭建的臨時大王爺殿，兩旁是小食檔及花炮棚，花炮棚內有九件神袍，是供奉給三位大王爺、天后、觀音、財神、佛祖及水仙爺爺等九位神明，但大會只請三位大王爺和天后神像到神棚內供奉。

神壇上三位大王爺神像位於正中，面對著醮棚，因為他們與元洲仔鶴佬漁民有密切的關係。

至於天后神像，就如James Watson指出，天后作為國家正統神靈，在社區中建築一座天后廟，可以使該社區被視為「開化」的地區，而控制此廟宇的大族，亦能獲得正統的身份。過往漁民被視為「化外」之民，邀請天后到來，可能是希望獲得「開化」正統的身份認同。<sup>22</sup>

戲棚內近舞台左邊位置設有一臨時辦事處，是工作人員當值之處，管理一切事宜之總部。辦事處內張貼了寶誕捐款和收入支出總表通告，粵劇和白字戲海報。而在戲棚正門出入口更貼有各界友好贊助芳名及捐贈金額。

而13個花炮會還炮後，會把炮膽放在神壇前，神位前放有紅、黃、綠三色大王爺符，香油箱，殿前有供品桌。戲棚門前有兩柱貼有兩副對聯，向街道的一對是：「神恩賜五福、蘇徐李鍾石」；向戲棚的一對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戲棚有一個巨型花牌，該花牌由八個花牌組成，橫寫有「恭祝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誌慶」字，豎書有「神光普照」、「風調雨順」、「神恩庇祐」、「福澤萬家」、「酬謝神恩」和「國泰民安」等字，由新界李氏宗親會大埔分會，蘇來，徐志文，蘇帶，蘇偉強，徐志強、大埔元青花炮會、大埔鄉事委員會、大埔西江體育會，香港惠霞花炮會，安全花炮會等送來賀誕。

## 五、儀式

每年誕期一連十天均會上演神功戲，前五天上演粵劇，後五天則是白字戲，風雨不改，今年由6月21日（農曆五月初六日）至30（十五日），上演神功戲。

### 1. 農曆五月初六日（6月21日）

早上9時迎神，委員先上香稟告神明，為酬謝神明保佑，元洲仔蘇、徐、李、鍾、石五姓漁民現迎接大王爺到風水廣場觀賞神功戲。之後由值理整理三位大王爺的行身，再由鑼鼓開路捧上汽車，載到廣場。將神像安置後，再到大埔舊墟天后廟，由總理蘇馬俊迎接天后神像到大王爺殿，迎神儀式便完結。

下午2時，儒釋道功德同修會由黃維溢道長帶領會眾與經生到來賀誕。道長們先在大王爺殿前舉行三獻禮及讀祝文儀式，然後在花炮棚內進食帶來的酬神供品，而職員則收集會眾捐獻。據徐傑文稱，該會由一群篤信赤松黃大仙祖師的弟子及信眾分支出來，原在黃大仙龍翔道，現在會址已遷到深水埗。因有元洲仔五姓漁民是該會會眾，故該會於十多年前來到這裡參與大王爺誕。

約下午4時，道長先在會場灑符水和混有符灰的五色豆，為會場灑淨去穢，接著由梁志德道長請呂純陽祖到壇扶乩，由值理詢問賀誕乩文，該會道長解釋乩文。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請來呂祖，但是降乩途中，天后接替呂祖來到乩壇，而且天后到來時更降雨潔淨。神明要求五姓人要團結，繼續辦好大王爺誕。

一個廟宇的興盛涉及很多因素。過往海陸豐神明的廟宇安置在山邊或海邊，廟宇簡陋，如何透過扶乩幫善信求問醫藥靈方或吉凶而令到廟宇香火鼎盛，則要進一步探究。

晚上7時15分開始上演粵劇，沒有進行特別儀式。

### 2. 農曆五月初七至十三日（6月22至28日）

大會安排了13個花炮會分三天還炮，情況如下：

第一天有三個花炮會，分別為蘇氏蘇雄堂花炮會、鍾氏花炮會和李氏花炮會。

第二天有八個花炮，包括香港惠霞花炮會、蘇氏二房花炮會、大埔徐氏合勝堂花炮會、鍾氏工友聯合會、安全花炮會、蘇氏祥鳳公飛燕堂花炮會、徐氏東海堂花炮會和李氏聯誼堂花炮會。

第三天有兩個花炮會，包括大埔元青花炮會和石氏宗親會。

各花炮會首先在大元邨或太和邨集合，然後由警察開路前往風水廣場。領隊是手持大旗的男丁隊伍，他們帶領花炮，接著是手持木槳、雨傘、羽扇或長竹，重覆扒龍舟動作的如「陸上扒龍舟」的女子隊伍，她們跳得興高彩烈，引得途人紛紛舉起智能電話拍攝。婦女穿著鶴佬傳統服式，將頭髮紮髻，插上頭飾，或戴上濶邊花帽，

打扮花姿招展，以示尊重神明。接著還有舞龍舞獅及鶴佬麒麟隊伍，最後為帶備大量供品（包括生豬、燒豬、生果、紅雞蛋、平安包和薑等）的隊伍，浩浩蕩蕩前往風水廣場。

各花炮會到達會場後，均先將供品放在神明前，上香參拜完後，一眾成員下跪，由資歷最老的成員——多是男性，也有女性——主持向神明祈求問福儀式，主要是詢問神明是否滿意供品，若擲得勝杯表示來年一切順利，若得寶杯或笑杯表示不滿供品。擲杯後，成員到神壇香油箱捐香油，並取了一疊代表三個王爺的符，與供品一同分派給各成員，祈求來年得到大王爺庇佑，完成後花炮會隊伍便離去。有些隊伍會先到天后宮拜祭天后，然後再到大王爺殿拜祭大王爺。在天后宮拜祭時亦有問杯，探問神明是否滿意供品的程序，希望來年順利。大會限定每隊花炮會的參拜時間為半小時，所以還炮和拜祭的程序都很緊湊。

各花炮會在參與人數與供品上存著競爭，一些經濟較富有、族群政治佔優的花炮會，其隊伍一般較其他花炮會更具規模，如蘇氏祥鳳公飛燕堂花炮會是13隊參與隊伍中最具規模的，這是由於蘇姓是元洲仔鶴佬漁民人丁最多的，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選拔村代表、委員執事等公職自然佔有一定優勢，其花炮會表現了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實力。

### 3. 農曆五月初八（6月23日）正誕

是日為正誕，日場劇目有賀誕例戲，包括「八仙賀壽」、「跳加官」和「天姬送子」等，除了為大王爺賀誕，也表明了族群希望有加官進爵和人丁興旺的俗世想法。

當八個炮會完成還炮儀式後，有一班由黃姓師傅帶領，來自大埔寶湖道街市觀音殿的13名信眾來到賀誕，他們當中多是中年的婦女，其中一人為男性。他們身上掛有一個三角形符咒的袋和一串珠。黃姓師傅口中唸唸有詞，信眾亦跟隨唸頌，並手持原先掛在身上的符咒與帶來的一些衣物在神棚內的香火前轉圈，似要取得神力，帶來好運，解危化劫。黃師傅取大王爺符分與信眾。

筆者曾到訪觀音殿考察，廟內除供奉觀音外，還有供奉其他神明，有數把類似簾刀的物品插在香爐上，但是由於坐在殿外的男士拒絕受訪，故未能取得進一步資料。究竟他們來到賀誕是為了得到大王爺庇佑，是希望吸引更多信眾的宣傳技倆，還是希望令人留下他們是正統教派，非旁門左道的印象，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晚上8時許，大會頒授感謝旗典禮，出席者有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惠州市統戰部副部長陳滌成、惠州市惠陽區委統戰部部長黃雄、惠州市大亞灣區管委會兩辦副主任黃俊來、大埔鄉事委員會副主席張國棟、大埔七約鄉公所主席梁官華、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文春輝、大埔各界協會主席李國英、大埔體育會主席王平雲及大埔警區警民關係主任曾海亮等人。

首先由大會總理蘇馬俊致詞。接著大埔民區政事務助理專員邱詩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主席李耀斌和大會副總理蘇來先後發言。蘇馬俊和蘇來的發言，主要是表示大家是建制派的人，要支持建制派，指責泛民投票反對政改方案，扼殺了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權利。其他人的發言，只有提及要保育傳統。頒授感謝旗變成了政治表態和拉票活動舞台，兩位總理藉這舞台表達其為建制派代言人的身份。

### 4. 農曆五月十一至十五日（6月26至30日）

這天是由惠海鴻利職業白字戲劇團演出五天白字戲的首天。當演員演得精彩時，觀眾會即場「打賞」，甚至將一串紙錢掛在台上，這對演員們有鼓勵作用，亦是「有面子」的舉措。但是亦有觀眾只感到阻礙觀賞。

### 5. 農曆五月十三日（6月28日）抽炮

下午3時大會舉行了抽炮儀式，花炮號碼放在紅封之內，各花炮會按上年所得的花炮次序抽花炮，抽得紅封便知道今年得到那一個花炮。抽完花炮後，各隊伍取回相應號碼的炮膽，炮膽是三個王爺造像，但第十三炮是天后，曾詢問值理，但沒有人知道原因，這個有待日後探究。一些花

炮會的成員是有姓氏限制的，如鍾氏花炮會，其他如香港惠霞花炮會和安全花炮會則是五姓人均可參與。有些隊伍是即場分取花炮福品。安全花炮會友好的商人和魚欄，透過競投福品支持其花炮活動；元青花炮會亦有投福品活動，支持其花炮賀誕活動，除此之外，每位成員均要捐助1,800元左右，支持活動費用。其他花炮會並沒有投福品活動，但成員每人要捐助2,000元左右支持活動。

早年大會有15個花炮，有十六、七隊人競投花炮，以價高者投得花炮，其後風火堂與李氏合慶堂花炮會等退出。現時變成了每隊花炮會支付5,000元以抽籤形式競投花炮。花炮會退出原因各有不同，據徐傑文指，風火堂徐志洪師傅亦是元洲仔漁民，以前是其中一個花炮會成員，但自徐志洪兄長遭遇交通意外後，他們還炮後便再沒有參與抽炮活動。但他們每年仍會組成風火堂體育會前來賀誕，已參加了35年。今年他們於6月28日當天前來。晚上有慶祝活動，多數魚欄會透過投福品支持其賀誕活動。花炮會活動呈現了既凝聚成員，又有分化的因素。

## 6. 農曆五月十五日（6月30日）

上午9時，總理蘇馬俊在鑼鼓聲中將天后神像送回天后宮，再將三位大王爺神像捧上汽車，在鑼鼓引路下將大王爺神像送回廟宇，而九件神袍也隨即焚化，賀誕在上演完神功戲成後也隨之結束。

## 六、總結

元洲仔大王爺誕呈現了不同層次的地緣關係。族群成員通過參與賀誕活動，體現了地域社區與社區成員身份的重新確認，通過捐助款項，將社會的聯盟組織、友好村落等地緣關係具體地勾勒出來。

元洲仔的大王爺誕不單是酬謝神恩，亦有維持社會關係的功能。大會總理蘇馬俊在頒感謝旗典禮中指，要加強族群聯繫，族群是建制內的人，我們要鼎力支持建制派，可見宗教活動變為政治發表平台。

## 註釋

- <sup>1</sup> 廖迪生，〈引論〉，〈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載廖迪生、張兆和、黃永豪、蕭麗娟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及推動大埔區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2008），頁11-12。
- <sup>2</sup> 廖迪生，〈引論〉，〈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載廖迪生、張兆和、黃永豪、蕭麗娟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頁92-102。
- <sup>3</sup> 有關元洲仔的居住環境，可參閱劉潤和、高添強，《歸程烹願——香港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1977年，香港電台節目，「獅子山下：元洲仔之歌」展現當地漁民在棚屋生活的情況，引起各界廣泛關注。
- <sup>4</sup> 鄭肇祺，〈建新市鎮：填海工程及居住環境的發展〉，《大埔傳統與文物》，頁222-231。
- <sup>5</sup> 徐傑文訪問。徐傑文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曾任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值理部首和執委，現任該會副財政主任；其父是漁民，曾任該會執委，徐傑文在學校假期時曾跟隨其父出海捕漁。
- <sup>6</sup> 2015年《大埔元洲仔籌建會所暨重修大王爺廟紀念特刊》指出，因漁民在農曆二月期間多忙於捕魚，所以正式慶典活動多在每年農曆五月、六月或七月擇吉舉行。
- <sup>7</sup> 〈元洲仔漁民演戲定四日晚上開鑼〉，《大公報》，1955年9月1日，第4版。〈元洲仔漁民今起演大戲〉，《大公報》，1956年6月21日，第5版。
- <sup>8</sup> 鍾偉強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鍾氏穎川堂主席、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值理部首和總務。
- <sup>9</sup> 蘇來訪問。蘇來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元洲仔漁民代表、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永遠會長、副總理。
- <sup>10</sup> 近大埔三門仔比華利山別墅附近。
- <sup>11</sup> 〈當局計劃興建平房安置元洲仔漁民〉，《華僑日報》，1966年2月11日，頁13。

- <sup>12</sup> 近大埔三門仔比華利山別墅附近。
- <sup>13</sup> 每年誕期，元洲仔海陸豐漁民均會組織大埔元洲仔大王爺神廟管理委員會，他們設立「部首」一職，負責收取五姓成員每人定額資助，支持慶祝活動。
- <sup>14</sup> 臨時辦事處位於戲棚內戲台左邊的位置。
- <sup>15</sup> 13個花炮會包括蘇氏蘇雄堂花炮會、鍾氏花炮會、李氏花炮會、香港惠霞花炮會、蘇氏二房花炮會、大埔徐氏合勝堂花炮會、鍾氏工友聯合會、安全花炮會、蘇氏祥鳳公飛燕堂花炮會、徐氏東海堂花炮會、李氏聯誼堂花炮會和大埔元青花炮會和石氏宗親會。
- <sup>16</sup> 文春輝是大埔泰亨鄉原居民、前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榮譽會長、大埔區議會副主席及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
- <sup>17</sup> 白字戲是指正字戲傳入粵東和閩南後，與當地的海豐、陸豐方言民間音樂結合，並用當地日常方言演出而逐漸形成的劇種。當地人稱中州官話為正字，稱本地方言為「白字」，故稱白字戲。
- <sup>18</sup> 梁官華是大埔七約鄉公所主席。
- <sup>19</sup> 陳笑權是大埔體育會副主席。
- <sup>20</sup> 張國棟是大埔聯益鄉主席。
- <sup>21</sup> 大埔舊墟天后宮建於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當年原處海濱，因歷年填海擴地，現今已坐落於大埔市中心。大埔舊墟由新界大族鄧氏創立於康熙十一年（1672）。
- <sup>22</sup>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pp. 312-313,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y*, eds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4.
- <sup>23</sup> 每台戲例必上演的經常儀式及劇目。「神功戲」演出的例戲包括《六國封相》、《八仙賀壽》、《跳加官》、《天姬送子》及《破台》（即《祭白虎》）等。

##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 South Asian x HKUST

*Service Learning Intercultural Summer Camp*

## 南亞科大共融營

現正招募義工

### Now recruiting volunteer helpers

\*歡迎所有科大學生報名 \*Open to all application of HKUST Students

Date: 27<sup>th</sup> and, or 28<sup>th</sup> July, 2015 (Mon & Tue)  
Venue: HKUST Campus  
Serving Whom?: South As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What?: Language Games, Campus Tour, Cricket, Henna Drawing, Cooking, Handcrafts, etc.

Helper Training Session: 25<sup>th</sup> July, 2015 (Sat)  
(from 13:00 to 18:00)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Leonard (6976 8337) and Tony (9189 9045)

Register

Co-organizers: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HKUSTSU  
Caritas Community Center - Ngau Tau Kok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HKUST  
The South China Search Center, HKUST

## 懷念傑克·古迪（Jack R. Goody）教授(1919-2015)

當代人類學泰斗、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傑克·古迪教授，2015年7月16日於劍橋安詳辭世，享年95歲。《歷史人類學學刊》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同仁深表哀悼，並向古迪教授致以最高的敬意。

古迪教授生於1919年7月21日。1938年在劍橋大學就讀英國文學系。二戰時在北非從軍，為德軍所俘，囚獄三年。戰後重回劍橋聖約翰書院，1946年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取得人類學文憑。其後再返劍橋攻讀人類學，師從Meyer Fortes，以北加納（northern Ghana）的LoWiili和LoDagaa族群的社會組織和生活為題撰寫論文，1954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展開其在劍橋畢生的學術生涯，1973年成為William Wyse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1976年任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2004年任英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古迪教授多次受勳，2005年以其對社會人類學的貢獻獲封爵。

古迪教授著作等身，出版書籍達30餘種，論文無數，終其一生，孜孜不倦，晚年還在2012年出版了《金屬、文化與資本主義》（*Metals, Culture and Capitalism*）一書。他文采博學，見解精微，視野恢宏。論者認為：古迪教授「主要以三個因素解釋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首先是精耕細作的農業有利於積聚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則為從婚姻到喪葬等各種文化實踐，以至於非洲與歐亞社會的大分野，提供瞭解釋。其次是他通過都市化和官僚制度的發展改變甚或凌駕了家庭或部落等社會組織的傳統形式解釋社會變遷，認為文明實際上是『城市的文化』。其三，他高度重視傳播技術對心理和社會變遷的影響，並把書寫傳統的發軔與剩餘價值的運用聯繫起來，在與Ian Watt於1963年合作的一篇論文中，他認為古希臘科學與哲學的崛興，實有賴於字母的發明。此三種因素同樣適用於理解當代的社會體系或歷時之系統性變化，其研究成果因而對許多學科皆甚具啟發。」（參見David R. Olson & Michael Cole eds.,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mplications of the Work of Jack Goody*, 2006, “Preface”。）

古迪教授生於英倫，壯年時深入非洲，畢生以比照東西文化為念，力圖跨越學科與時空之藩籬，中華文明在其論著中，自是常客。其《花文化》（*The Culture of Flowers*）一書，既參考典籍，略談傳統中國梅蘭菊竹四君子，亦涉足省港兩地花市，試論社會主義（廣東）與資本主義（香港）不同的社會中，花之命運如何各自不同，意味深遠。吾等謹借《通訊》一隅，向古迪教授獻上昔日在華南處處綻放的素馨花一束，為他在天堂裡的學術花園，添上幾許芬芳。

#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